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刘德有

内容提要：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关键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 缔约谈判 反霸条款 和平友好

作者简介：刘德有，原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3.3.1

文章编号：2096-0484（2023）03-0001-16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日两国以法律形式把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其重要意义在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联合声明》一道，成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然而，45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格局大变动和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这一条约的信守正面临新的复杂局面。其中，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和负面影响来自日本违背条约基本精神的动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值此时刻，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探究和平友好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原因，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英明决断中汲取政治智慧，对于发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缔约障碍和曲折的谈判过程

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周恩来总理曾就中日关系问题多次提到“先复

交、后缔约”的“两步走”设想。^①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在中日复交谈判时即向日本提出的，得到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积极响应。周总理反复强调，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单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将来形势好了也要友好，而且要世代友好下去。^②

（一）“反霸条款”成为缔约障碍

1972年9月，中日两国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方式实现了复交。其后，按照联合声明的规定，缔约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孰料，本应顺理成章的中日缔约，却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延宕多时。究其根源，障碍主要来自日本政局变化和日方拒绝写入“反霸条款”。

20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作为《光明日报》记者被派往日本常驻，70年代又改任新华社驻日记者，因而有幸通过实地采访了解到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过程的某些细节以及日本政界部分鲜为人知的幕后情况。^③ 通过长期采访，笔者当时的直觉和印象是：1972年9月中日复交后，人们普遍认为两国会很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因为联合声明的第八条明确规定：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④。

当时，人们大多乐观地认为，条约的内容自然应以《中日联合声明》的表述为基础，只需将其中的内容条文化即可。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曲折——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竟然花费了整整六年时间！

最初，中日双方在进入谈判的准备阶段时，进展还算比较顺利，双方的态度都很积极。笔者对其中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1. 1974年8月15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竹入表示，日中复交已经两年了，应尽早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竹入还表示，日中两国要建立长期的50年、100年的友好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相信这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邓小平回应道：“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口信，我们注意到了。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邓小平

① 参见张香山：《邓小平同志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载张香山：《张香山记忆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第282页。

② 转引自张义素：《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报告会概述》，《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第156页。

③ 有关亲历中日复交历程的回顾，参见刘德有：《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顾与前瞻》，《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0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第1版。

特别强调：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① 竹入表示，他本人的看法跟邓小平一致。

2. 周恩来总理当时虽在病中，仍然委托竹入义胜给田中首相带去了亲笔信，表示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田中予以积极响应，主张立即进入谈判。

3. 1974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乔冠华与日本外相木村俊夫会面，均表示同意尽早缔约。

4. 同年 11 月，韩念龙副外长访日，在签订中日海运协定的同时，与东乡文彦外务次官就缔约问题进行了第一次预备性会谈。以此为开端，中日双方举行了十几轮缔约预备性谈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74 年下半年，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权力斗争骤起，日本政局出现动荡，使缔约顿时增加了难度和未知数。田中首相被指控在任通商产业大臣期间，曾收受美国公司贿赂^②，受到谴责并面临牢狱之灾，陷入了极度的被动。田中内阁被迫于同年 11 月 6 日宣布集体辞职。下届首相究竟由谁来担任便成为日本政局的焦点。对于中日关系而言，谁出任日本下届首相成为预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能否早日缔结的“晴雨表”。

当时，争当首相的自民党人士有福田赳夫、三木武夫和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也跃跃欲试。自民党内各派系之争日趋白热化，酝酿着一场“你死我活”的竞选混战。然而，日本财界不希望政局陷入混乱，而希望局势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自民党出于对局面不可控的担心而“急中生智”，推举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出面进行调解。经过一番幕后活动和讨价还价，椎名悦三郎最后煞有介事地宣布“裁定”结果：推荐三木武夫出任首相。

（二）三木内阁态度消极，缔约谈判搁浅

三木武夫是自民党内弱小派系“三木派”的首脑，素有“巴尔干政治家”之称，其特点是“看风使舵”“左右逢源”，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依照常规，作为自民党内非主流派的三木不大可能成为首相。因为需要平息自民党内激烈且难以收场的派系斗争，三木才被抬出来暂时缓和党内矛盾。总的来说，三木对华态度还算比较友好。中日复交前，三木曾是复交推进派^③，曾专访中国与周总理进行会谈。因此，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人们普遍认为他上台也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2039 页。

② 史称“洛克希德事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出售飞机向日本政界行贿，此事件导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 1976 年被捕，而时任首相三木武夫也因此遭到自民党内各派联合反对并最终在第 34 届日本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惨败下台。

③ 1972 年 7 月，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内大平派和三木派的支持下，以承诺上台后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竞选公约击败福田赳夫而当选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

肯定会积极推动。三木在出任首相不久后的国会施政演说中确实也明确表示“要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①

然而，出乎人们预料，三木上台后接二连三地“节外生枝”，使问题复杂化，中日缔约工作由此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当时中日间出现的分歧焦点在于，日方极力反对在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所谓“反霸条款”，来源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一段文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② 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也有相同的表述。^③

对于这一原本不应成为问题的条文，三木内阁却执意反对把它写入和平友好条约。出现此种情况有两个背景：一方面在于三木内阁中占据主流的反华势力不断作祟，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正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夺霸权的苏联的强烈反对。在苏联看来，反霸就是“反苏”，而三木内阁的真实意图是顾忌苏联的反应而取消“反霸条款”。后来，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三木内阁无意与中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如此，它还企图把缔约谈判中断的责任转嫁给中国。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似乎早已看清了三木武夫的行事轨迹，并早有预料。日中友好人士、曾被称为日本在华“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的秘书南村志郎在2018年出版的《充当日中外交隐形人60年：受委托带三木亲笔信的一个日本人的回忆录》^④一书中，首次披露了日方从未公开过的幕后情况。

南村志郎在书中写道：大约在就任首相的三四天后，三木突然给南村打电话，让其尽快到他家去一趟。三木还指定南村要在翌日午夜12时到达，而且别走前门，要从后门进。南村感到很诧异，因为此种要求是违背常情的。但仔细一想，前门有许多报社记者蹲守，不方便。所以也只能如此。南村乘出租车按约定的时间到了三木家。没有被记者发现。他从后门进到客厅，看到三木独自一人坐在客厅椅子上，身穿西装，但未打领带。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三木对南村说：“拜托您，把这封信尽快送达。”南村仔细一看，信封上写着“周恩来总理阁下”。后面写着三木的名字。信未封口。由于是“亲笔信”，不便细看，便问三木信的内容是什么。三木说：“我一直想亲手在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写自己

① 「第七十四回国会衆議院會議録第二号（二）」、『官報』号外、昭和49年12月14日、<https://kokuai.ndl.go.jp/txt/107405254X00219741214/9> [2023-04-0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第1版。

③ 中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第1版。

④ 南村志郎『日中外交の黒子六十年—三木親書を託された日本人の回想録—』、川村範行・西村秀樹編、ゆいぽおと、2018年。

的名字，请周总理予以协助。”^①

大约过了两天，南村直飞北京，把三木首相的“亲笔信”交给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地点是在中日友协的会长办公室。南村是用包袱皮裹着“亲笔信”带去的。他对廖承志说：“三木首相委托我带来了‘亲笔信’，烦请您交给周总理。由于我是信使，受人之托，因此需要一个确实收到的凭据。如有可能，请给我一个回信。”廖承志说了一句：“明白，您辛苦了！”南村没有得到预想的回复。他在住宿的新侨饭店等了一个星期。每天无所事事。由于杳无音信，实在等不及了，便打电话给廖承志。廖承志不无惊讶地说：“哦，原来您还在北京啊？”便约定第二天在中日友协见面。廖承志对南村说：“看来，您跟三木先生很熟。但是，三木先生是不会在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请您心中要有数，但可以继续跟他打交道。”^②

南村回国后没有直接与三木首相联系。当然，他也不能对三木说“您不会签订条约”。最后只是把仅仅装着一枚回执的信封，交给了三木事务所的事务局长。信封上写着“三木武夫总理阁下”。在书中南村写道：“从结果看，后来的事态发展轨迹完全符合中国的预判。”^③

中国有此判断，皆出于对三木内阁的了解。事实上，不仅中国对日外交的实务部门，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其时都在密切关注着三木武夫首相和日本大选的动向。据《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1976 年 9 月 7 日条载，离世前两天的毛泽东，“清醒时，示意要看材料。当工作人员听不明白要看什么材料时，在纸上画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工作人员明白是要看有关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④

1975 年 5 月，中日副部长级缔约预备性谈判因日方拒绝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搁浅。同年 9 月 24 日和 27 日，中日外长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两次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缔约谈判宣告中断。

三木内阁对缔约的消极、冷淡态度，在日本国内很不得人心，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在日本全国掀起了要求尽早缔约的浪潮。不仅如此，包括保守党在内的许多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奔走、呼吁，友好团体举行集会，要求并敦促日本政府顺应时代潮流，早日下定决心。这些活动提出的诉求，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反霸条款”明确地写进条约之中。

① 南村志郎『日中外交の黒子六十年—三木親書を託された日本人の回想録—』、川村範行・西村秀樹編、ゆいぽおと、2018 年、20—21 頁。

② 同上书，第 21—22 页。

③ 同上书，第 22—24 页。

④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651 页。

二、谈判的重新恢复及最终缔约

1976年12月,三木内阁集体辞职,福田赳夫出任首相。从此,日本政局开始发生变化,中日缔约进程也出现了新局面。

(一) 福田内阁的态度转变与中方的审时度势

福田赳夫出任首相后,在翌年1月的国会施政演讲中说,他的内阁执行的是“全方位外交”,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只要“反霸条款”是符合《日本国宪法》基本精神的,就愿意早日缔结。这一调门,听起来与三木武夫刚上台时差不多,但总算对外表了态。当然,日本国内各界人士要求早日缔约的呼声并未停止,而是继续高涨,此起彼伏。

197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回顾当时,国际形势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其时,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四化”建设时期,开始同一些西方国家开展经济交流。美国及欧洲各国都十分看重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积极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这种情况怎能不刺激日本?尤其是日本经济界生怕落后于美欧各国,很想大力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为此亟须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也取得历史性突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势头。到了1978年,中美建交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这一形势使环绕福田首相周围的“台湾帮”深感大势已去,继续抵制日中缔约已没有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这些人的判断是,如果福田下了缔约的决心,他们也不好继续强硬反对。

中方审时度势,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消极态度,其中一个主要渠道就是通过公明党推动缔约进程。1977年1月,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时,中方曾暗示,如果福田内阁在“反霸条款”上不节外生枝,能站得高、看得远,那么中方准备予以响应。竹入回国后向福田首相说,关键在于首相的态度。如果首相下决心,缔约谈判有可能进行得很顺利。福田很赞赏竹入的中介努力,并开始逐步修正三木内阁的政策。^①

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② 1978年3月,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访华时,福田首相委托团长矢野绚也向中国政府转达他“决心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

^① 参见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20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立场。邓小平于 3 月 14 日会见矢野，矢野转达了福田的口信。^① 邓小平以及后来通过廖承志阐述了中方的四点意见：（1）根据中日联合声明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主张，中国没有变；（2）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反对霸权无对象则不合道理；（3）双方均不干涉对方内政；（4）希望福田首相作出决断，在联合声明基础上有所前进。邓小平欢迎园田外相访华。^②

此后，福田首相开始积极调整自民党内的意见，因为自民党内仍有一些人对缔约持消极或反对态度。尽管如此，自民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福田。因此，福田以充分的信心继续进行党内的说服工作，最终完成了自民党内的意见调整。^③

1978 年 1 月 21 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④ 福田赞同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正文，但主张增加“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第三国条款”。对此，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

与此同时，福田首相还顺利地协调了同美方的意见。1978 年 5 月，福田首相同园田外相访美。5 月 3 日，卡特总统同福田首相会谈时明确表示对日中关系的进展感到高兴，“对美国来说，反对霸权不存在问题”。在同园田外相会谈时，万斯国务卿称赞并支持日中谈判的立场，包括支持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由于美国政府赞同，日本政府就缔约问题进一步下了决心。福田首相结束访美后表示，缔结和约的谈判自开始以来过去了六年，现在已到了极限，不能再等了。^⑤ 岸信介等自民党内几个顽固反对的元老此时也不再提出异议。外务省对缔约的态度也变得非常明朗。在此背景下，自 1975 年 9 月中断将近三年的缔约谈判重新恢复。

当时，笔者结束了在日本长达 15 年的记者生涯，于 1978 年 6 月回到北京。不久，中日缔约谈判有了新进展。从同年 7 月 21 日起，韩念龙副外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以及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等日方代表在北京开始了工作会谈。经过 14 轮会谈，8 月 7 日在事务层级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以此为铺垫，园田外相访华。

园田在二战期间曾被征入伍，当过驾驶军机横冲直撞的“特攻队员”，但未等他“玉碎”，日本便宣布投降，因而捡了一条命。园田在福田内阁最初担任官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79 页。

② 参见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421—422 页。

③ 参见《福田父子的中国渊源》，环球在线，200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07-10/18/content_6188162_2.htm [2023-04-01]。

④ 『第八十四回国会衆議院會議録第 3 号（二）』、『官報』号外、昭和 53 年 1 月 21 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08405254X00319780121/9> [2023-04-01]。

⑤ 参见林晓光：《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过程与中日关系》，《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2 期。

房长官，1977年11月转任外相。早在1954年夏，他同后来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和出任众议院议长的樱内义雄等12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团赴瑞典参加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会议，后途经莫斯科来到北京，下榻东单的“北极阁”。访问期间，笔者曾陪他参观过官厅水库等项目。在笔者任驻日记者期间，园田念旧情，不忘老朋友，在国会议员会馆办公室同笔者会见，并进行了亲切交谈。

园田在日本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名叫北村博昭，曾做过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驻北京代表。由于他擅长剑道，是园田任会长的“剑友会”的会友，园田知道北村跟中国的关系较深，特别是跟廖承志等可以接触到中国高层的人士熟悉。由此，北村逐渐成为园田与中国高层人士联系的“联络员”。据北村博昭回忆，1976年园田出任官房长官后立即把他叫到首相官邸，高兴地说：“首相决定要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太棒啦！”又说：“福田首相指示我要积极考虑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①1978年1月上旬，在园田授意下，北村前往北京向廖承志介绍了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想法。当时二人是在北京饭店会面的。

1978年8月2日，中日第九轮事务级谈判结束后，日方谈判代表中江要介临时返回日本进行汇报。福田首相在箱根听取中江的汇报后，立即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为了早日缔约，福田当场决定派遣园田外相访华。8月5日，园田对外宣布他将于8月8日访华。

应当说，当时在日本国内仍有不少阻力。右翼势力总要借机寻衅滋事，他们开着好几辆大型宣传车三番五次到外务省示威，自民党内的右翼派别“青岚会”成员也在夜里不断往园田家里打骚扰电话。但园田没有屈服。可以说，园田是顶着巨大压力去北京的。启程之前，园田每天早晨都要洗冷水浴，从头上浇几桶冷水以表决心：不谈成和平友好条约，决不回国。园田前往北京那一天，从东京羽田机场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专机起飞，在途中飞越故乡熊本县天草时，他指示驾驶员绕天草盘旋数周，并发誓拼死也要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使命。

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事务当局间多轮谈判，双方终于就条约草案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在条约第二条写上：“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四条还规定：“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国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②这样，条约与《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文保持了一致。

1978年8月10日，即条约签署前两天，邓小平会见园田外相，并表示：

^① 参见北村博昭：《一段鲜为人知的缔约秘话》，载《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中日关系》，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人民日报》1978年8月13日，第3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对中国是一个约束，中国永远不称霸，条约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① 会谈结束前，园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日方的一些报道，透露了福田首相相对日中缔约的考虑。福田认为，当时日中双方都有十分强烈的意愿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用福田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日中已经建成的“吊桥”改建为“铁桥”。通过日中邦交正常化，两国搭好了“吊桥”，彼此拥有了交流的渠道，但“吊桥”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行，唯有通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将“吊桥”升级为“铁桥”，人员与物资等所有层面的交流方能全面活跃起来。^② 当时，中国正面临通过改革开放使经济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课题。为此，中日决定在两国之间架起“铁桥”，开启所有领域的交流。中国决心在改革开放体制下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各领域交流特别是经贸往来。邓小平和其他中日高层人士在做出这一决断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条约签订和邓小平访日

1978年8月12日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6日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16日和18日分别在日本众参两院通过。

条约签订后，北村博昭撰文写道：“园田先生曾多次表示，他遍访世界各国，与很多国家的总统和首相会谈过，但是像中国的邓小平阁下那样度量大、处事果断的人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老一代伟人们的精心浇灌下，日中友好之花才能结出今日的硕果。^③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在东京的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和福田首相出席了仪式。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证书，条约正式生效。

福田首相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承诺：日本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全面合作。^④ 访问期间，邓小平走访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参观工厂，乘坐新干线，与日本经济界人士会面。他通过这些活动，耳闻目睹了日本经济发展情况，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② 参见《人民中国》2016年8月20日报道，中国报道网。

③ 参见北村博昭：《一段鲜为人知的缔约秘话》，载《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中日关系》，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④ 参见《人民中国》2016年8月20日报道，中国报道网。

从中获得了中国借鉴日本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思路,结合中国的实际,按既定的战略和方针思考并擘画了中国发展经济的蓝图。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能有今日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邓小平的运筹帷幄,而邓小平的日本之行,启发了中国的现代化观念。^①

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其热烈气氛,令人感动”^②。日方对邓小平的访日特别予以重视,安排代表团一行住在为国家元首下榻专用的“赤坂迎宾馆”。而一向关心中国问题、业已完成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大任的园田尤其感到高兴。在中日互换批准书当晚,作为饭后的“点心”,园田特地吩咐北村去东京涩谷区南平台的寿司店订购了四大漆盘的“江户前”寿司,请邓小平和廖承志等人品尝,以示庆贺和款待。北村博昭回忆道:“由于漆盘太大,汽车的后座都放不下。我当即把它拍照了下来,作为纪念。这几大盘寿司寄托了园田先生多少深情厚谊啊!实现日中友好,一直是夙夜不忘的目标,可以说如今终于功德圆满了!”^③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使中日双方在国际法意义上结束了战争状态,两国得以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推进各领域交流,共享和平发展的红利。

三、缔约 45 周年的思考

中日双方克服重重困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已整整过去了 45 年。在此期间,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巨大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回望笔者亲历的缔约过程,越发使人感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来之不易。在新形势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条约的当事国是否仍须信守诺言,严格遵守条约?回答是肯定的。今天,围绕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有几个问题需要严肃认真地加以思考。

(一) 日中和平友好的“铁桥”需要维护而不被锈蚀

在曾经交战的国家之间,缔结和平条约是比政府间声明更高层次的、从法律意义上结束战争状态的必要程序。早在中日复交会谈时,周总理就提议把两

^① 邓小平在参观完日产公司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00页。

^② 参见北村博昭:《一段鲜为人知的缔约秘话》,载《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中日关系》,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③ 同上。

国间条约的名称定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即在两国和平条约中加了“友好”二字，其意义就是希望中日能世代和平友好相处。周总理的方案立即得到田中首相的赞同，于是被正式确定下来。^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彼此为搬不走的邻居。无论何时，和平友好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头等重要的大方向，这在当前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然而，在迎接缔约 45 周年之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座两国和平友好的“铁桥”正面临着被锈蚀的严峻局面。究其原因，缔约 45 年来中日两国的国内条件和相互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消极变化趋势。与 45 年前相比，中日两国早已今非昔比。今天，中国最突出的变化是快速崛起，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日缔约时的 1978 年，中国 GDP 为 1495.41 亿美元，日本 GDP 为 1.01 万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的 6.75 倍。而到了 2022 年，中国 GDP 已达到 18 万亿美元，日本 GDP 则为 4.23 万亿美元，中国为日本的 4 倍多。^② 日本的经济总量已从世界第二退居世界第三。日本对百年“日强中弱”的格局向“中强日弱”的转变很不适应，表现出了强烈的战略焦虑，意欲借助日美同盟和西方价值观联盟等外部力量，并通过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特别是在东海、南海、台海“三海”问题上加大了“挟美制华”力度。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变化趋势，正在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

其二，日本政治生态朝着“保守化”方向变化。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趋势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已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其表现为新生代政治势力在中日关系的诸项原则问题上向《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政治文件发起挑战。他们要在历史问题上“摆脱赎罪意识”，在台湾问题上推动日台关系升级，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搁置争议”底线，直至推动构建以围堵并迟滞中国发展为目的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

其三，中日两国的社会舆论和民众感情持续恶化。近年来，日本政坛形成了执政的自民党“一党独大”、其他在野弱党林立的“一强多弱”局面，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总体上更趋保守化。随着两国关系内外条件的变化，两国社会舆论和民众感情负向变化的恶性循环趋势不断加剧，20 世纪 70—80 年代那种高比例的相互好感度已经不复存在。^③

^① 参见丁民：《回顾与展望——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25 周年》，《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第 42 页。

^② 参见世界银行关于世界各国发展指标的数据库，<https://databank.shihang.org/indicator/NY.GDP.MKTP.CD/1ff4a498/Popular-Indicators> [2023-04-01]。

^③ 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概要』、2023 年 2 月、<http://survey.gov-online.go.jp/r04/r04-gaiko/gairyaku.pdf> [2023-04-01]。

以上述变化为背景, 缔约 45 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其中, 头 15 年是两国关系在条约精神的引领下健康发展的时期; 后 30 年, 中日政治关系进入冷暖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时期, 两国关系或在负面因素冲击下跌入低谷, 或在双方相向而行的努力下止跌回稳。由于相互间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低位徘徊。

中日之间存在分歧与矛盾是客观现实,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两国互为近邻, 同为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 双方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因此,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我们应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尤其要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大方向。这个大方向不是别的, 就是 45 年前两国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和平友好。中国坚持与日本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 也不会发生改变。而这一愿望变为现实的重要前提是日方也应相向而行, 愿与中方一道共谋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长远大计。

然而, 最近几年, 人们不时地从东邻听到一小撮人热心扩充军备、修改宪法, 要走老路的声音。对此, 我们不能不有所戒备。近代, 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 给中华民族造成过深重的灾难, 创伤至今未愈, 日本人民也曾在那场灾难中遭受军国主义之害。两国人民对此都不应忘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 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 而不在人民, 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犯下的严重罪行。”^①

历史证明,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战后至今, 在日本一方面确有一股妄图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势力, 经常无端地挑事, 但另一方面反对日本重走侵略老路, 要求与中国世代友好、加强交流的健康力量依然存在, 始终给争取美好未来的中日人民带来希望。

今天的中日关系的“铁桥”是战后两国人民付出艰苦努力缔造起来的^②, 它得来不易, 需要大力维护, 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损害它。如果有谁损害它, 怎能对得起两国先辈付出的心血, 又怎能面对两国后世子孙?

(二) 中日和平友好需要以信守承诺为保证

中日和平友好不是口号而是行动, 需要两国共同努力来加以落实。

第一, 在当前形势下, 中日双方尤其要再次确认日本就中国领土台湾所做出的郑重承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庄严宣布: “(中日) 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4 日, 第 2 版。

^② 参见孙平化、刘德有:《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85 年 10 月 27 日, 第 3 版。

遵守”，这就意味着日本政府重申了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正式表态和应承担的义务。日本的这一正式表态和承担的义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宣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

然而，近年来，日本部分政客接二连三地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发表涉台谬论，妄议和干涉中国内政。他们鼓吹“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和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甚至叫嚣“要保护台湾”。^①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竟然妄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将会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届时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防卫台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②2023年4月16—18日，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召开，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包含了严重干涉台湾问题的内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向会议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③这是日本政府试图“挟美西方制华”战略的又一次丑陋表现。

难道日本政府忘记了 50 年前，即 1972 年中日复交发表的联合声明吗？声明的第二条明确地写道：“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④特别是，“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白纸黑字写进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中，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⑤难道日本政府忘记了这些都是自己曾经信誓旦旦向中国政府做出的郑重承诺吗？怎么能不讲诚信，明目张胆地推翻前言呢？

我们不能不提醒日本政府，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曾发动侵华战争，对台湾岛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对中国人民是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的。二战后，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但日本国内一些势力至今觊觎台湾之心不死。他们对日本近代穷兵黩武、疯狂侵略

① 参见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9 月 9 日以及观察者网 2021 年 9 月 8 日报道。

② 参见日本时事通讯社 2021 年 7 月 6 日报道。

③ 参见《2023 年 4 月 18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4 月 18 日，http://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202304/t20230418_11061086.shtml [2023-04-20]。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72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人民日报》1978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进一步载明：“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人民日报》1998 年 11 月 27 日，第 6 版）

扩张、野蛮殖民奴役的历史劣迹非但缺乏正视和反思，反而企图借渲染炒作周边事态来谋求自身的军力突破。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应谨言慎行，切实做到言而有信，恪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能采取任何支持和助长“台独”的举动，不要试图在台海掀起风浪。

第二，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中日双方有必要重温 and 重申反霸、反强权原则。

45年前，为了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中日两国在和平友好条约中作为中心内容旗帜鲜明地写进了“反霸条款”。这是世界上唯一载有“反霸条款”的双边和约，它为稳定亚太地区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国际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对话交流、互学互鉴、文明共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未来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人类正经历着罕见的多重风险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正在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冲击，给全球发展和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新形势、新发展中，新机遇和新挑战层出不穷。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征程，正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为当下的大变动、大变革的世界注入了充沛的正能量和稳定性。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非要在世界另起炉灶，而是要对现有国际关系范式进行补充、改革与完善。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念和主张，与美国顽固推行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任何挑战世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的历史修正主义，都应受到坚决抵制。

近年来，在美国出于新冷战思维挑起所谓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日本显示出了试图紧跟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趋向。日本固执于这种“小圈子”政治，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国际正义，严重背离中日和平友好的原则，其发展道路只会越走越窄。日本需要从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大局出发，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而不是以邻为壑，唯美国马首是瞻，死心塌地参与遏制中国的新冷战。日本错误做法的结果，只会严重损坏中日关系的根基，使中日两国旧伤未愈，又添新痛。近期，有的日本政客甚至公然发表违背本国“无核三原则”^①的妄言，抛出与美国“核共享”话题^②，充分暴露出其国内军国主义势力阴魂不散的危险

^①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三项原则最早于1967年12月由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答辩中提出，日本国会1971年通过决议将其规定为日本的国策。

^② 参见中国日报网2022年5月14日报道。

动向。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依然是客观存在。因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没有过时。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幸福，反霸依然是世界人民面对的长期的战略任务。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制裁，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遏制打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坚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路径，主张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更多贡献。

（三）中日和平友好需要加深各领域的合作

中日复交特别是缔约 45 年来，两国间曾经形成就共同发展进行对话与协商的各种机制。对于中日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分歧，两国已经和正在通过对话与协商共同探索求同存异的路径。2023 年 4 月初，日本外相林芳正应邀访华，这是 2022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曼谷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的新进展。近期，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十五轮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中日防务部门之间海空联络机制也已建成。这些都表明，中日两国已在就推动相互关系止跌回稳采取实际行动。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防止相互分歧与矛盾升级的最好办法就是加深相互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中日经济合作正处于向更高层次升级换代的机遇期。中国将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商机，对于美国所要推动的所谓“脱钩”战略则必将采取坚决措施给予抵制和回应。日本不应盲目参与“脱钩”，而应看准中国新一轮发展机遇而积极深化日中经济合作。

当今，中日双方的发展状况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加深各领域的合作，应当而且可以继续成为两国共谋发展的重要路径。另外，作为两个重要大国，中日两国应当共同承担起维护地区稳定、造福各国人民的责任。为此，中日应为推动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加强对话与合作。

（四）中日和平友好的基础在于两国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关系中，民间交流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正是长期的“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成功推动中日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恢复了外交关系，进而通过缔约从国际法意义上结束了国家间的战争状态。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在于两国广大人民之间的友好。

当然，两国民众感情的变化与中日关系好坏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中日关系趋好时，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相应提高；中日关系恶化时，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相应降低。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中日两国民众在一些问题上的感情对立依然存在，现实利益的矛盾与摩擦也会不时出现。如何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增进相互理解，改善国民感情，是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紧要课题。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中日民众感情受到中日关系大环境的制约，但反过来，谋求中日世代友好的两国民众的巨大力量也是避免中日和平友好偏离正轨的制动阀。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也有差异，但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增信释疑，睦邻友好。如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中日两国应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因为中日双方早已达成一个共识：“互为伙伴，互不构成威胁。”^①我们要严格遵守，说到做到。双方要继续发挥地理相近、人文相通的独特优势，开展多渠道交往交流；尤其要着眼长远，在大力开展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的同时，要下大力气积极开展青少年交流和文化交流，塑造客观积极的相互认知，促进民心相通。

我们应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为契机，重温条约精神，恪守条约原则。展望未来，我们在继续推动两国和平友好关系进程中，重要前提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两国只有共同坚持和平发展，才能给自身、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利益。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日本也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四、结语

本文夹叙夹议从缔约45年的回望一直写到当今的思考。成稿恰逢2023年的清明节。笔者忽然想起周恩来总理年轻时曾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樱花烂漫时节东渡日本，探求“人间的万象真理”^②。1972年，他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与其他中日领导人一道，成功地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不是推迟六年而是在复交后不久就实现，那么周总理也许会亲自前往东京出席条约的批准书互换仪式，那将是多么美好温馨的场景！^③

缅怀为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掘井人”，我们更要坚定信念，排除干扰，为维护和发展来之不易的中日和平友好局面而努力。

(收稿日期：2023-04-05，责任编辑：林昶)

① 参见《中日双方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新华社曼谷2022年11月17日电。

② 参见周恩来：《雨中岚山》。

③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以后，田中角荣首相相对周恩来总理说，日本正在改造天皇的离宫，要将其修成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他邀请周总理做国宾馆修好后的第一位客人，周总理当即表示，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他就访问日本。

Abstracts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Sino 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Review and Reflection / Liu Deyou / 1

The signing and official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1978 China 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is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bilateral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is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for generations, and also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two peoples and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oking back at the lengthy process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o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the issue of “anti-hegemony clauses” has becom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lay in signing of the treaty. Under the decisio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of both countries,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s finally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The soul of the Sino Japanese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is peace and friendship, and its core is the rejection of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The spirit of the treaty must be faithfully observed.

Keywords: Sino Japanese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negotiations; Anti-Hegemony provisions; peace and friendship

The Disrup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upply Chain in the Wake of the Ukraine Crisis and Its Strategic Influences / Feng Yujun and Zhang Rui / 17

The Ukraine crisis ha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st-Cold War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and poses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ystem.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imposed a comprehensive energy embargo and energy price cap on Russia. While Europe is experiencing temporary difficulties such as high prices, it is striving to end its energy dependence on Russia. As a result of Western sanctions Russia has lost the ability to receive large energy investments and advanced energy technolog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the Russian energy export market has shrunk according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accelerating Russia's exclusion from their energy supply systems. Concerns about “high politics” such as security and values are rapidly trumping concerns about “low politics” such as economic ties and market availability. The disrup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upply chain will have complex and profound implications at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evels.

Keywords: Ukraine crisi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energy supply chain; strategic impact; Russia

Overseas Port Pivot Strategies: Major Powers and Their Model Choices / Wang Xu / 36

Through reviewing the rise of the major power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ajor powers generally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overseas port pivot strategy, and consider overseas ports as the pivot for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major powers for overseas ports are mainly the search for sea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resources and energy securit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s, overseas market development and geopolitical influence. In strategic promotion, private sectors in the port-transport-industry chai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ordinating with